顏擇雅：出版作為公共判斷的形成

思想養成・出版實作・雅言文化・公共寫作・經濟論述・余英時・文學閱讀

一份把出版人、翻譯者、散文家與公共評論者放回同一條職業脈絡理解的深度研究。重點不只在「出了哪些書」，而在她如何形成判斷、如何把一本書做成公共問題，以及這套方法本身的限度。

繁體中文全譯｜資料更新至 2026 年 9 月｜21 項主要來源

導覽：13 個入口

點擊章節名稱可直接跳到正文。PDF 側邊欄另有完整章節／小節書籤；正文來源編號可直接開啟原始網頁。

1. 柏克萊之前：資源、互相競爭的權威，以及不純粹的閱讀教育

家庭閱讀環境、政治敘事衝突，以及早期編輯感受力的形成

2. 學位背後的大學：圖書館、語言，以及重讀

柏克萊、跨太平洋閱讀、重讀與比較文學形成

3. 「一人出版社」故事遮掉的學徒期

迪茂、時報版權工作，以及獨立之前的產業知識

4. 創辦雅言：一本書、一段關係，以及一個開口

《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余英時與創業網絡

5. 編輯判斷：不是「好書」，而是為什麼現在要讀

選書、類型突破、翻譯在地化與對讀者的理解

6. 書目：不是一套單一教義，而是一組公共問題的工具箱

《世界是平的》《正義》《拚經濟》與公共知識的可討論化

7. 真正的商業結構：小組織、集中風險、廣泛依賴

一人公司的實際經濟、風險與外部合作生態

8. 散文家：先改變問題，再回答問題

教育、教養、康德、寫作方法與「反轉診斷」

9. 台灣經濟：反對把困境診斷成人格缺陷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發展階段與公共政治後果

10. 余英時：把思想繼承做成編輯工作

思想關係如何轉成選編、保存與制度判斷

11. 2026 年的村上春樹書：為什麼小說不是離開公共世界

評點傳統、細讀方法、村上春樹與人生判斷力

12. 限度：當編輯命題跑得比證據更快

預測失準、版本刪節、副標定調與出版權威的風險

13. 她究竟做成了哪一種志業？

把閱讀、版權、商業、寫作與公共判斷組成一種工作方式

引用來源

21 項主要來源；文內共 42 次引用，皆保留可點擊連結。

顏擇雅，1967 年生，是出版人、翻譯者、散文家與公共評論者。她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2002 年創辦雅言文化。她所經手的出版物，可以從魯西迪《魔鬼詩篇》、佛里曼《世界是平的》，一路排到桑德爾《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自己的寫作則橫跨教育、經濟發展、日常社會行為與文學閱讀。 [1]

這些活動經常被分開描述：有一個善於經營「一人出版社」的出版人，有一個立場鮮明的公共評論者，也有一個閱讀量廣、能以文學說理的知識分子。但如果把它們切得太乾淨，反而會錯過她最有辨識度的地方。

我的核心理解是：**她真正長期處理的題目，是「判斷」——人怎麼會把某件事看成可欲、可信、正常、重要，或可能；而這些判斷又如何能被改變。** 出版是介入這個過程的一種方法。詮釋小說、重新質問一條關於教養的常識，或挑戰對台灣經濟困境的慣常診斷，也都是。

這並不表示她的判斷永遠正確。相反地，她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張力，恰恰存在於幾組距離之間：商業上非常有效的命題，與證據充分的結論之間；讓一本書變得容易進入，與預先決定讀者該怎麼讀它之間；鼓勵獨立思考，與一個極有自信的中介者本身所擁有的權威之間。

她值得研究，正因為這些都不是抽象問題。它們具體出現在她選了什麼書、哪些關係使這些出版成為可能、她如何為書定調與命名，以及她後來如何在公共空間裡提出自己的論辯。

1. 柏克萊之前：資源、互相競爭的權威，以及不純粹的閱讀教育

家庭背景很重要。顏擇雅在 2015 年接受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訪談時，談到父親是醫師，家中大量購買書籍與畫冊；外祖父曾是台中中央書局股東，母系家庭也承接了較舊式的古典教育傳統。書並不是她在逃離原生環境之後才發現的異物；它本來就是家庭物質生活的一部分。 [2]

這一點放在志業史裡尤其重要。從小有書可讀，當然不會自動生產出一個獨立思考的成年人，但它會改變起點：什麼知識看起來是可以接近的、長時間閱讀是不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求知是否必須先為自己辯護。

她更有意思的一段養成，是她後來稱之為讀「**垃圾**」的經驗。她在 2017 年的自傳性文章回憶，自己讀的是管理嚴格的天主教女校，學校不鼓勵言情小說，卻會指定學生閱讀帶有政治宣傳色彩的刊物；家中同時又有《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黨外刊物。互不相容的說法，讓她很早就有機會對照同一個政治世界如何被不同敘事組織。另一方面，獵奇社會新聞並沒有阻止她進入「嚴肅文學」，反而把她帶向白先勇、黃春明，甚至莎士比亞。 [3] [4]

這比「經典好書提升一個早慧孩子」的故事有意思得多。關鍵的啟蒙未必是發現了更高級的內容，而是發現：不同權威會用不同方式安排同一個現實。

這裡已經有一種早期的編輯智能：在決定一個敘事說了什麼之前，先注意它是哪一種敘事、選了什麼、漏了什麼，以及它企圖在讀者身上產生什麼反應。

十五歲赴美，也沒有直接把她帶進某種文學志業。她在 2026 年的訪談裡回顧，大四才從預醫轉入比較文學，而且令父母非常震驚。她也沒有把自己描述成柏克萊政治運動中的核心人物；相較之下，圖書館與閱讀更強烈地佔據了她。 [4]

因此，這不是一條簡單的「台灣傳統背景，後來被美國自由教育解放」的敘事。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幾個本來就已經相當厚實的世界，在她身上形成不整齊的接觸。

↑ 回到導覽

2. 學位背後的大學：圖書館、語言，以及重讀

她回憶大學教育時，最有意思的機構往往不是教室，而是圖書館。

在美國，她透過公共圖書館補上文化知識的缺口，也讀到在她早年台灣生活中不容易接觸的魯迅、沈從文等中國作家。柏克萊的視聽館藏，則提供莎士比亞錄音、詩人朗讀、古典音樂、樂譜與語言學習材料。她的閱讀教育，同時也是聆聽的教育。 [2]

所以這段跨太平洋移動有一個意外的結構：去了美國，也重新改變了她接近中國文學的方式。「西化」這個詞，太粗糙了，無法描述一條經由美國制度性館藏，又繞回華文文本的路線。

她後來談書，也同樣抗拒把閱讀想成一次性的效果。在那篇談「垃圾閱讀」的文章裡，她提到自己在人生不同階段重讀巴爾札克《高老頭》，等到生活經驗使其中的社會羞辱、攀附與位置感變得可理解，作品才真正顯出力量。 [3]

這個區別——「擁有一個文本」與「終於有能力讀懂它」之間的區別——是理解她思想氣質的一個關鍵。一本讀不進去的書，不一定本質上不可讀；有時只是讀者還沒有認出書中人物所承受的那種壓力。

她說真正改變工作方式的書

她在 2026 年回顧形成自己的幾本書時，特別有意思，因為它們不是一張永恆的最愛清單，而是被她連到不同人生階段。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提醒她，人可能如何藉幻想逐漸失去與現實的接觸；《唐吉訶德》幫助她理解，怎麼和思考方式與自己很不一樣的人溝通；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讓她思考社會變動，以及出版人如何可能參與其中；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則是她三十歲前翻譯的作品，也成為一本關於人如何重新開始的書。 [4]

我對這組書的理解是：文學在她這裡，提供的是**誤認與調整的模型**。人會誤解自己的欲望；社會情境拒絕配合人的期待；聰明不會消滅自欺；災難也不必然終止人生的可能。

這跟把文學主要理解成「精緻經驗的儲藏庫」很不一樣。小說有用，是因為他人並不透明地向我們敞開——包括老闆、讀者、政治上的對手，以及我們自己。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比較文學教育後來能進入商業出版，而不只是被縮減成「溝通能力很好」這種可轉移技能。更深層的轉移，是理解動機、慣例、落差與期待的能力。

↑ 回到導覽

3. 「一人出版社」故事遮掉的學徒期

雅言創業故事太有戲劇性，以至於容易讓人以為她是從愛讀書直接跳到自己做書。實際上，中間有一段不短的出版學徒期。

她二十七歲時從美國被**迪茂國際**延攬回台，放棄原本可能繼續走的研究所道路。最初的國際協調工作，逐步擴張到編輯與行銷；在迪茂兩年多之後，她又到**時報文化**擔任版權部門主管約四年。她也曾以本名**顏秀娟**從事翻譯。 [5]

這段工作的重要性很容易被低估，因為版權交易不像封面、譯文或署名文章那麼容易留下可見痕跡。

但一本外版書在成為讀者可以買到的東西之前，必須同時以很多形式存在：它是一份稿件或外文版、一個合約機會、一筆財務承諾、一個翻譯案、一張製作時程表，以及一個通路必須能理解的銷售命題。編輯品味只佔其中一部分。

我的推論是，版權部門的經驗給了顏擇雅一種特殊的現實感：一本書可以在知識上極其出色，卻仍可能因為定位錯誤、權利談不到、時機不對，或無法被通路說明，而在商業上失敗。

它也意味著，她成為獨立出版人之前，早已身處網絡之內。這個差別非常重要。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局外人，和一個已經在外版權市場裡累積專業信用的人，都可以成立一家很小的公司，但兩者擁有的資訊、談判信用與可調動的合作關係完全不同。

這也是為什麼「低資本」這種說法常會誤導。一家公司可能不需要很多現金才能成立，卻仰賴多年累積的能力與信任。

獨立不是反商業

她在 2018 年的訪談裡說，自己不只從暢銷書學，也從失敗出版學；甚至曾經在台灣銷售不佳的作者，她後來也可能重新出版。先前失敗的銷售史，不一定代表作者沒有市場，也可能暴露的是：書選錯了、時機不對、說法沒有找到，或接觸讀者的方法失敗。 [6]

這是理解她實作的一個極重要區別。

暢銷排行榜告訴出版人，需求已經在哪裡變得可見。失敗的書，有時反而可能指出一種被處理失敗的需求——當然，也可能證明原先想像的需求根本不存在。要分辨兩者，不能只是追趨勢。

這是一種詮釋性的工作，但詮釋最後會遇到外部測試：讀者可以不買。

↑ 回到導覽

4. 創辦雅言：一本書、一段關係，以及一個開口

雅言文化 2002 年的第一本書，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它的誕生並不是一份早就寫好的創業計畫被執行出來。

依顏擇雅後來的說法，是歷史學家**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把這本書的訊息轉給她。當既有出版社不願意接手時，她才提出自己成立公司來做。美國版權方對一家甚至還不存在的公司當然有所疑慮；余英時親自介入，才協助建立足夠的信用，讓這樁交易完成。 [4]

這是一個很精簡的例子，展示知識網絡如何變成生產基礎設施。一位重要學者不只是提供日後文章可以致敬的「思想影響」；他的名望在這裡直接使一筆商業談判成為可能。

創社第一本書也顯示，同一本書在不同市場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在台灣，它的價值不只取決於一位美籍華人律師對中國政治經濟的預測是否成真。當時中國熱持續升溫，它提供了一個顯眼的反命

題，也能成為本地公共爭論的材料。早期報導也記錄了雅言安排章家敦與大前研一在台北公開辯論。[5]

這並不替預測失準開脫。它只是把出版人可能購買的東西拆開來看：一個論點、一個時機、一位可被帶到現場的作者、一場爭論，以及重新組織既有話題的機會。

這個差別，後來會成為評價她生涯的重要問題。

《魔鬼詩篇》：創業神話容易漏掉的合作勞動

同一年，雅言出版了魯西迪《魔鬼詩篇》的中文版。譯者**閻紀宇**當時因安全考量匿名，二十年後才公開承認自己是譯者。他回顧，翻譯前花了大量時間準備伊斯蘭與南亞背景，也參考學術注釋。台灣版於 **2002 年 10 月 16 日**出版。[7]

這個案例很清楚地揭露，「一人出版社」不等於一個人產出所有知識。譯者提供了專門研究、詮釋勞動，也承受了一部分風險。

它也使雅言早期選書很難被縮減成單一的商業類型。一邊是預言中國政治經濟崩潰的非虛構書，一邊是一部形式複雜、作者長期受死亡威脅的小說。把它們連在一起的，不是統一的文學品味，而是願意把有爭議、卻被她認為台灣讀者應該有機會接觸的材料帶進公共領域。

她的獨立因此同時有商業性，也有公民性。但這種公民主張，最後仍然要靠非常俗務的工作才能成立：談到權利、找到譯者、完成編輯決定、把書做出來，並確實讓它流通。

↑ 回到導覽

5. 編輯判斷：不是「好書」，而是為什麼現在要讀

顏擇雅很值得保留的一個說法，是出版的難處在於說清楚：**讀者為什麼應該讀這本書**。在另一場訪談裡，她也把自己尋找的書描述為能夠「**突破類型**」的作品——它不只是某一類書裡又一本做得不錯的例子，而是改變這一類書的可能性。[5]

這兩個標準互相關聯，卻不完全相同。

一本書可以在類型內部標準上非常出色，但對一般讀者來說，沒有任何迫切理由接近它。反過來，一本書也可以碰到一個很急迫的主題，卻幾乎沒有帶來讀者原本不知道的東西。顏擇雅理想中的選書，似乎要同時有獨特性，也有可以說清楚的用途。

所以出版不只是把外國聲望搬進台灣。出版人要找出的，是一本書內在做成的事情，和讀者尚未清楚說出的問題之間，究竟在哪裡碰得到。

Ron Clark：翻譯也是調整一個社會情境

Ron Clark 的《**優秀是教出來的**》提供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經過授權後，顏擇雅把原書關於住飯店給服務人員小費的規則，改成較廣義的「**接受別人的服務要惜福**」，而不是把陌生的社會慣例原封不動當成普遍性的教室規範。[5]

這個很小的修改很有啟發性。字面保存有時能保住文字，卻誤認了社會情境；適度改寫，反而可能在改變表面的同時保留教育目的。

但它也把很大的詮釋權放到出版人手上。有人必須決定那個「目的」到底是什麼、哪些元素只是偶然的文化習慣，以及什麼本地語言有資格取代它。

出版就在這裡開始接近作者性，又不等於作者性。會定調、命名、重組、授權改寫的出版人，確實參與決定讀者最後遇到的是什麼物件。

讀者既不是信徒，也不是抽象市場區隔

顏擇雅談文學訓練時，很強調感知別人的情緒，以及注意人們尚未知道自己需要的資訊；她談職場時，也強調理解別人做決定背後的理由，而不是只因對方的決定不合己意就憤怒。 [6]

這裡最有意思的可能性，是把商業理解成一種注意力訓練。不能只叫讀者「品味好一點」。出版人必須理解一本書有可能從哪裡進入一個真實的人生。

同一種能力當然也有倫理風險。理解他人尚未說出口的焦慮，可以幫助溝通，也可以幫助操控。因此，不能只因為這個原則聽起來很好，就決定她在每個個案裡都做對了；還是必須一案一案看。

↑ 回到導覽

6. 書目：不是一套單一教義，而是一組公共問題的工具箱

三本書足以顯示範圍：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由雅言在 2005 年出版；桑德爾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在 2011 年出版；張夏準的《**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則在 2018 年由潘勛、楊明暐翻譯出版。 [6]

把這些書拼成一套一致的經濟哲學會是錯的。佛里曼對全球化的敘述，與張夏準讓公民比較不同經濟學派、質疑單一專家正統的做法，並不是同一套世界觀。

比較準確的讀法，是把這部分書目視為一種企圖：改變一般讀者覺得「自己有資格討論什麼」。

全球化不必只屬於企業高層的語言。經濟學不必完全交給經濟學家。道德哲學也不必只能以一套遠離現代決策的思想史形式出現。

這並不等於親民化可以取消專業。比較像是出版人在協商：專業應該在哪裡與公共推理相遇。

桑德爾，以及把一個問題做成「可以討論的東西」

樂為良翻譯的《正義》尤其重要。它的後續生命並不只存在於暢銷榜：元智大學的圖書館紀錄，顯示它在 2013、2014 年被納入新生閱讀等教學脈絡。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說明一本商業出版物如何進入教育場域；但也不應誇張成「一本書改變了台灣課程」這種難以證實的說法。 [8]

顏擇雅自己對中文書名的解釋也很有代表性。2011 年書剛上市時，甚至有書店採購問她「思辨」是不是應該寫成「思辯」。她說明，「辨」取自《中庸》「慎思、明辨」，並且刻意不直譯原文副標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9]

這個動作看起來很小，思想上卻很有份量。一種看似「輸入」的推理實踐，藉由本來就存在於中文的詞彙資源，獲得新的可理解性。

所以這也不是「西化」與「保存本土文化」之間二選一。外來的書，啟動了本地語言裡原本就有的資源；而本地語言，也反過來決定外來的書如何被理解。

但一個有吸引力的詞，也可能脫離原先論證，獨立成為文化身分的徽章。「批判思考」或「思辨」可以迅速變成一種現代感的表演。出版人成功普及一個詞，不等於日後所有掛在這個詞底下的推理都同樣有品質。

↑ 回到導覽

7. 真正的商業結構：小組織、集中風險、廣泛依賴

雅言早期的數字很醒目，但應該放回正確類別。2005 年 2 月的報導說，創社將近三年只出了八本書，而《優秀是教出來的》五個月左右就賣出約 **12 萬本**。這是當時報導的銷售數字，不是經過查核的淨利資料。 [5]

但它至少確立一點：出書少，並不等於流通量小。

從這段歷史推回去，可以看見一種「選擇性承諾」的商業邏輯。出版社不一定需要最大化每年的新書數量；如果少數幾本書能夠承受非常集中的編輯與推廣投入，低產量也可以成立。但這個模型同時把風險集中起來。選錯一本書、翻譯出問題，或找不到進入讀者的方法，在書目很小的時候都會更痛。

一人公司確實能降低某些固定成本，卻不會把版稅預付、翻譯費、編輯、設計、印製、庫存、發行與銷售勞動變不見，也不會讓創辦人的時間無限延長。

現有公開資料不足以證實雅言每年的營收、營業利益率、目前成本結構，或顏擇雅個人收入中有多少來自出版、多少來自寫作與其他活動。談公司「多賺錢」時，應該在這些未知之處停下來。

「一個人」描述的是決策中心，不是生產方式

光是前面的譯者名單，就已經證明這是一個分散式的生產系統。顏擇雅自己的公共工作也同樣散布於多個場域：報紙、雜誌專欄、出版活動、教育場合與廣播。她 1999 年第一次固定寫專欄是在英文《Taipei Times》，之後也在《財訊》、《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天下》、《親子天下》等媒體寫作；她也以 Joyce 之名出現在 NEWS98 張大春的節目裡。 [1]

這些不只是把一個已經完成的個人品牌送到不同平台的宣傳渠道。它們也是不同的觀察場：問題在哪裡形成、解釋可以怎麼測試、一種聲音又如何逐漸被辨認。

我的推論是，雅言之所以可以很小，部分正因為它周圍的網絡很大。公司不需要把所有資源都收進組織內部，因為創辦人本身就參與多個能提供讀者、討論、信用與合作關係的機構。

這比「孤獨天才」或「個人品牌」兩種說法都更準確：它是一個獨立的決策中心，但其有效性依賴許多公司之外的人與組織。

↑ 回到導覽

8. 散文家：先改變問題，再回答問題

顏擇雅自己的散文，在《**愛還是錯愛**》與《**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裡尤其清楚。

前者集結她自 2009 年起的教育與教養專欄，相關寫作獲得 **2014 年金鼎獎雜誌類專欄寫作獎**。這些文章經常使用同一種動作：先質問「建議」之前的診斷是不是就錯了。學校的問題也許不是競爭太多，而是可被承認的競爭種類太少；孩子看起來比較沒禮貌，也可能與社會條件改變有關，而不只是家長溺愛；學業成績很好，也可能遮蔽一個人其實不太會選擇適合自己的未來。 [1]

這種方法的強處，在於它能中斷自動化的道德評斷。與其先問「怎麼讓孩子更努力」，不如先問這個環境到底承認哪幾種成就；與其先怪人格，不如先看那種行為是在什麼配置裡變得合理。

我的理解是，這幾乎就是她編輯方法的散文版：找出那個熟悉分類開始無法解釋眼前對象的地方。

相應的風險是，「反轉」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可辨識的風格。「問題不是 X，而是 Y」非常具有修辭快感；但它最後有沒有價值，仍取決於 Y 是否真的比 X 更能解釋，而不只是更不熟悉。

康德、吃飯，以及思考的社會條件

《**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於 2016 年由印刻出版，題材橫跨工作、愛情、教養、金錢、名聲、閱讀與寫作。書名文章藉由「一起吃得好不好」，進入友誼、工作、婚姻，以及康德對社交幸福的想像。它不是一本系統性的康德入門。 [10]

我比較在意的是它移動的方向。哲學不是被拿來把一個平凡場合抬高成大題目；相反地，平凡場合被用來測試一個哲學區分到底能不能讓我們看得更清楚。

餐桌尤其適合她的問題。它牽涉注意力、分寸、參與、能力不均，以及如何在不把每個人變得一樣的前提下共享空間。這些同時也是出版人與公共散文家會遇到的問題。

她的散文是做出來的，不是直接說到紙上

〈賽跑，在網中〉入選九歌 2017 年度散文並獲獎，2018 年公布。她談寫作過程時說，大約五千字的文章會寫五天，先寫到更多，再大量刪減；她也提到，自己思考時部分會經過英文、法文，因此要得到想要的中文，需要額外的加工。 [11]

這個說法很有用，因為它修正了她在公共場合說話很快、很有把握，因此「寫作也應該很輕鬆」的印象。

她的散文依靠壓縮：很多勞動被藏在後面，最後才出現一個看似直接的區分。表面的口語感，不等於沒有文學建構。

↑ 回到導覽

9. 台灣經濟：反對把困境診斷成人格缺陷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在 2018 年把她這套解釋方法帶進一個更持續的台灣論述。

全書的核心隱喻是發展階段：低處容易摘的果實已經摘完，接下來要發展新的工具，才拿得到更高的水果。成長變慢，不能直接證明國家正在衰敗，也不能直接證明年輕世代的人格變差。她在相關序文與書介裡，很明確地把這本書定位成對台灣整體性悲觀的一種拒絕。 [12] [20]

更完整的論證，也拒絕把台灣與中國看成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社會。被稱讚成「狼性」的行為，應該回到獎勵它的條件去看，而不是當成某種永恆民族性；中國也不該變成台灣所有升級失敗的萬用解釋。 [13]

這裡反覆出現的智識動作很清楚：把一個關於「人格」的裁決，改寫成一個關於「條件」的問題。

我會把這跟樂觀主義、或創業勵志寫作分開。更高的水果不是在說「保持正面就會成長」，而是在說過去有效的方法已經到頂。要再往上，需要新的工具與制度，光更努力地重複舊方法沒有用。

它也改變了時間想像。令人失望的現在，不必被理解成國家本質性缺陷的終極揭露；它可能是一段不同能力之間不舒服的過渡期。

公共影響力並不等於政治中立

這本書很快進入明確的政治場域。**蔡英文在 2018 年臺北國際書展開幕致詞時，直接提到自己前一天讀到顏擇雅的文章與《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並借用這套說法談台灣經濟轉型**。 [14]

所以，她的經濟評論並不只在私人讀者之間流通，不只是個人改善型的知識產品。

也不應把這些論點去政治化，包裝成單純「理性思考」的勵志故事。它們直接介入：台灣該怎麼理解自己、哪些比較有意義，以及人們應該把能動性放在哪裡。

但政治上有用，也不能預先決定論證在事實上就成立。一個說法可以幫助政府抵抗過度悲觀，同時仍然需要接受對該政府實際政策的檢驗。

比較好的標準，是看一個解釋能不能分清楚結構限制與原本可以避免的失敗，而不是看它夠不夠樂觀、或夠不夠反對誰。

↑ 回到導覽

10. 余英時：把思想繼承做成編輯工作

顏擇雅與**余英時**的關係，是她整個生涯最有後果的關係之一。它的意義遠超過「有一位敬重的思想家，兩人觀點相近」。

早年的版權談判已經顯示，余英時的聲望可以直接成為實務支持。後來，顏擇雅也參與他的公共文字流通：她回憶，2014 年太陽花運動期間，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最早就傳到她這裡。 [4]

這段關係最後更轉變成編輯性的保存工程。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於 2022 年 5 月由印刻出版，顏擇雅把多年散落於不同刊物的政論收攏起來。她的排序並不是單純照年代：書先放晚年的「最後見解」，再以六四之後與之前作為骨架，也讓香港九七前後的材料在其中構成轉折。 [15] [21]

排序本身就是一個怎麼讀思想家的論點。

她談這本書時，特別強調余英時一條長期主張：台灣面對中國共產黨，不應只是用另一種民族主義對撞中國民族主義，而應以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去爭奪道德位置。無論是否接受這套政治策略，它都比單純說她「親台灣」更精確地指出她所繼承的思想位置。 [15]

這把她放在一條華文自由主義的思想譜系裡，同時拒絕這條譜系必然導向對中國國家的政治隸屬。

還有一個制度上的細節很值得注意：《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由**印刻**出版，而不是雅言。她的編輯志業大於自己公司的書目。要保存一段思想關係，不一定就要把所有東西收進自己的品牌。

我認為，這對「出版人把一切做成個人帝國」的模型形成一個重要限制。人可以透過判斷哪個機構最適合某本書，而發揮高度後果性的編輯能動性。

↑ 回到導覽

11. 2026 年的村上春樹書：為什麼小說不是離開公共世界

她截至目前最新的重要著作，《**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於 **2026 年 6 月 1 日**出版。出版社介紹的結構，是十四個主題、二十九篇文章，處理六十八篇村上春樹短篇，範圍包括資本主義、自我、依附與人際關係。 [16]

書名有療癒感，很容易被誤讀成「把文學應用於心理舒適」。比較有意思的野心，其實是方法論的：示範細讀敘事，如何可能改變一個人用來生活的判斷框架。

古典評點，遇上當代日本短篇小說

顏擇雅自己標舉的閱讀工具，包括對照、側寫、隱藏訊息、伏筆與反覆；她也把這些技術放到小說的「冰山」理解裡：明講的表面，不等於作品的全部。她在 2026 年訪談裡還特別拿出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談「草蛇灰線」式的閱讀。 [4] [18]

書中分析〈**開往中國的慢船**〉的一章，很能顯示方法。她並不先給讀者一套「中國象徵什麼」的大理論，而是追蹤敘事者反覆出現的自我不確定：對身體變化、記憶、自己曾說過什麼，以及死亡如何與「中國人」發生聯想的遲疑。這些反覆，最後被辨認成一條藏在底下的結構線。 [17]

方法上的差異很大。不是先提出理論，再叫讀者去找例子；而是讓一個原本看似次要的重複，逐漸改變我們認為「主要問題」是什麼。

我的理解是，這裡最清楚地顯示她較早的中文閱讀資源與比較文學訓練如何連續。評點傳統相關的技術，不只是被展示成文化遺產，而是實際用來分析一個日本文本。

為什麼挑一個已經有那麼多讀者的作家？

她的回答非常實用：導讀應該把人送回原作。選一個取得容易、已有大量讀者的作者，會讓這種「回去再讀一次」真的可能發生；而讀者原本就熟悉，也比較能感覺這次解讀與自己過去看到的東西差在哪裡。 [4]

這裡是出版人在批評家裡面說話。

批評對象不是只依照一套內在的文學價值階序來選。可取得性、辨識度，以及再讀一次的可能，也屬於它的思想用途。

論證的限度，以及小說的用途

顏擇雅在這本書裡，把**經驗、感受與思維框架**想成一個互相作用的三角：經驗產生感受，感受影響我們怎麼理解世界，而那套理解又會回頭影響我們接下來經驗到什麼。小說可以把這些關係具體化，而不假裝每個人都以同一方式運作。 [18]

這有助於把村上春樹的書重新連回《正義》，而不是把它看成離開公共問題、退回純文學。

形式論證可以揭露矛盾，卻不一定能告訴我們，為什麼一個看似矛盾的看法對某個人變得不可放棄，或什麼經驗使某一種現實描述顯得不證自明。

小說可以從內部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這仍然只是對文學可能性的主張，不是證據，不能因此說「讀小說的人就會更有智慧、更不教條」。但它讓她回到文學批評這件事有一個很認真的目的：對命題做推理，與理解持有命題的人，是相關但不相同的兩種活動。

↑ 回到導覽

12. 限度：當編輯命題跑得比證據更快

要認真理解顏擇雅，不能只看她如何讓一本書變得有後果，也必須看「有後果」本身什麼時候會變成一種自我辯護。

成功的公共介入，也可以承載失準的預測

《中國即將崩潰》是最清楚的例子。譯者閻紀宇後來回顧時也直接承認，書中那項核心預測並沒有照預期實現。一本書成功引發討論、賣得好、或挑戰當時的主流想像，都不會因此證明它的預測正確。 [7]

這裡必須把三種標準分開：一本書是否吸引讀者、是否把被忽略的問題帶進討論、以及它的核心主張是否經得起證據。

第三項失敗之後，出版人仍然可以合理地主張第二項有所成就——但前提是差別說清楚。否則，「至少引發了重要討論」很容易變成逃避知識責任的話術。

這對一個最擅長把「為什麼現在要讀這本書」說得非常鮮明的出版人尤其重要。**有充分理由閱讀，不等於有充分理由相信**。

《西方憑什麼》：讓人容易接近論證，也要讓人有能力檢驗論證

2015 年，**周達智**詳細批評雅言版 Ian Morris 的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他指出中文版沒有收錄原書的附錄、註釋、延伸閱讀、書目、致謝與索引，並認為副標「**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錯誤地把讀者導向一個原書並非如此設定的問題。這是他對 2015 年台灣版的比對與批評；這裡並沒有重新逐頁校勘後續版次。 [19]

這個批評指到一條非常重要的編輯邊界：讓一本書更容易被遇見，與保留讀者檢驗它的條件，是兩種不同責任。

一個強力副標可以打開市場，同時也可能把讀者預先推向某個問題設定。刪除學術裝置，可以讓厚重作品沒那麼嚇人，也可能削弱讀者追查證據與異議的能力。

問題不是每一本大眾版都必須複製學術版的所有附錄，而是：如果一個出版人的核心主張之一是培養獨立判斷，那麼這個承諾，也應該延伸到讓讀者具備反對這本書的條件。

「有道理」這種權威，仍然沒有被解決

我更廣泛的保留，在於顏擇雅的公共聲音容易取得一種「常識被我看穿了」的權威。

抓到一個被忽略的區別很有價值。但它也可能造成錯覺：彷彿只要一次聰明的反轉，就足以處理整場爭議。細讀可以揭露小說敘事者的自欺；政治分歧卻不能總是靠診斷別人「沒有看懂」來解決。

真正的測試，應該是一個論點在初次修辭成功之後，還能不能繼續接受修正。

而她自己的養成其實恰好提供了這種修正資源：重讀、互相衝突的敘事、從失敗出版學東西，以及承認經驗會改變人能看見什麼。這些資源，只有在也被用來檢查她自己的判斷時，才真正重要。

↑ 回到導覽

13. 她究竟做成了哪一種志業？

真正有辨識度的成就，並不只是「一個文學系畢業生找到了一種可以靠閱讀賺錢的方法」。

顏擇雅把幾種不會自動聚在一起的能力，組成了一個工作方式：語言能力、文學辨識力、版權知識、談判意願、把公共問題說成一句可流通命題的能力，以及長期參與自己公司之外的公共機構。她的獨立，是在學徒期之後、透過關係長出來的，不是透過沒有關係而成立。 [5]

家庭書房、美國圖書館與大學、台灣出版社、譯者、余英時夫婦、雜誌、廣播與其他出版社，在這段歷史裡各自做了不同的事。如果全部都只叫「網絡」，反而太含糊：有些提供早期餘裕，有些提供實務技能，有些提供信用，有些提供專門勞動，有些則提供讀者。

我的結論是，她的志業仰賴在這些場域之間持續移動，同時不完全被其中任何一個場域支配。

出版人學到，人們不會因為「應該讀」就買書。文學讀者學到，人也不會因為一個論證形式上正確，就照著它行動。散文家學到，一個熟悉的解釋有時會阻止問題真正顯形。那麼，公共評論者反過來也應該學到：一個說得很漂亮的解釋，仍然不能免除證據責任。

因此，她 2026 年訪談裡最不浪漫的一句話，反而最能說明她：她把**努力賺錢、進入社會、處理各種不同的人**，視為獲得知識的來源，而不是把文學推薦成逃離社會的庇護所。 [4]

這個姿態給她的生涯一種特殊力量。商業不是一套令人遺憾、只是拿來供養思想生活的機器；和讀者、老闆、合作者、顧客相遇，本身會教育判斷。但市場也沒有被允許成為最後標準。

在她最強的狀態裡，顏擇雅把出版做成一種重新考慮的邀請：不只是「這是一本重要的書」，而是「這裡有一種方式，讓你重新看一件你其實早已遇過、卻可能理解錯了的事」。

而最後仍然懸著的問題是：這份重新考慮的邀請，是否也允許讀者重新考慮出版人自己。

↑ 回到導覽

引用來源

編號依正文引用使用。短題僅供辨識，未必等同網頁原題；每一條都可直接點擊開啟來源。

[1] PanSci 泛科學：《愛還是錯愛》作者簡介與書介

[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顏擇雅訪談，家庭閱讀環境、圖書館與閱讀養成

[3] Readmoo 閱讀最前線：顏擇雅〈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

[4] 鏡文學：〈如得其情——顏擇雅談「閱讀如何成為人生判斷力」〉，2026

[5] 《遠見》：雅言文化與顏擇雅的創業、選書及出版方法

[6] Cheers 快樂工作人：顏擇雅談出版、失敗書與理解讀者

[7] 一報：閻紀宇回顧《魔鬼詩篇》台灣版翻譯與出版

[8] 元智大學圖書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館藏與新生閱讀資料

[9] 《財訊》：顏擇雅〈當 Right 被譯為「權利」…〉，談《正義》與「思辨」譯名

[10] 博客來：《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書籍資料

[11] 中央社：顏擇雅獲九歌年度散文獎及〈賽跑，在網中〉寫作過程，2018

[12] 今周刊：顏擇雅《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序文與經濟論述

[13] 天下雜誌：顏擇雅談台灣、中國、狼性與發展階段

[14]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8 臺北國際書展致詞，提及《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15] 中央社：顏擇雅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及其編排思路，2022

[16] 印刻舒讀網：《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書籍資料，2026

[17] 金石堂：《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試讀，〈開往中國的慢船〉解析

[18] 中央社：盧郁佳讀顏擇雅《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2026

[19]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周達智評《西方憑什麼》台灣版，2015

[20] 臺北市立圖書館：《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作者與書目介紹

[21] 印刻：《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書籍資料

↑ 回到導覽